

日出东方

RICHU
DONGFANG

Zhongguo Gongchandang
Chuangjian Jishi

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

邵维正◎主编

日
出
东
方

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

RICHU
DONGFANG

Zhongguo Gongchandang
Chuangjian Jishi

邵维正 ◎主 编

杨邦荣 杨玉玲 ◎副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光耀

版式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邵维正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7-01-009932-3

I. ①日… II. ①邵…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8821 号

日出东方

RICHU DONGFANG

——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

邵维正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25

字数:396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9932-3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邵维正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艰辛而又辉煌的 90 年历程。俗话说：水有源，树有根。中国共产党的“源”和“根”，就是党的由来和创建。过去、现在、未来，是相互依存和关联的，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 90 华诞的时候，回顾和研究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这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起来，很有意义。

1

提起中共创建，认识并不都是一致的。西方早就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舶来品”、“卢布党”；海外有些人则散布“早产论”、“苏俄移植论”；国内也有些模糊认识，以为在中国建党“缺乏群众基础”，是“几个先进知识分子搞起来的”，等等。这关乎党的性质、建党的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确有弄清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不是偶然的，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要回答这个重大问题，必须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摆到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加以考察和分析。19 世纪中叶以来，资本帝国主义采取各种形式和手段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使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中华民族是不会甘愿长期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寻找国家的出路，持续不断地展开了多



方面的努力和斗争。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斗争，以统治阶级内部开明阶层发起的洋务运动，以及维新派推动的戊戌变法，都曾掀起一波又一波浪潮，但是最终都失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于20世纪初叶提出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学说，发动了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为主要目标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经过多次惨痛失败之后，终于在1911年武昌起义取得成功。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推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第一次确立起共和体制，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激起人们的期望，又一次落空了。一批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重新在探索国家的出路，随着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在此前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迫切需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已是呼之而出。再从国际环境来看，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列宁倡导的第三国际1919年成立，给中国先进分子以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促进了中国的建党进程。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正确选择。

本书的第一至四章正是围绕建党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理论基础展开叙述，论证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把必要性和可能性转变为现实，需要做大量细致而有效的组织工作。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建党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以及国际条件日趋成熟。1920年夏秋，经过必要的酝酿准备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先后在上海、北京展开了建党的实际工作，在这两地率先建立起地区性的党组织，并以多种方式与相关城市的志同道合者通报情况、建立联系。部分城市的建党骨干纷纷响应，由于各地政治环境差别较大，活动方式有所不同，而建党工作都在积极展开。到1921年春，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旅欧、旅日留学生中先后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尽管各地

建党时间和活动方式有些差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把建党活动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组织青年团等实际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两个方面相互促进。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并建议早日召开党的一大。李达在征求了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之后，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各派2名代表出席党的代表大会。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后期遭租界巡捕房侵扰，转移到嘉兴南湖完成了大会议程，由此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本书的第五至八章，叙述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

中共一大确定了党的名称和性质，成立了中央机构，标志着组织建党的完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作为中国革命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有全国集中统一的战斗力强的组织，而且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方针和纲领。党的一大明确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这是正确的、可贵的，然而由于会议比较仓促又缺乏经验，没有来得及制定现阶段的具体纲领，这项使命历史地落到党的二大肩上。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当前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完善党的创建工作。党正式成立之后，有计划地展开了以学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实际工作，不久就出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面貌。

3

本书的第九、十章，着重叙述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完成。

从上述对本书简要梗概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这本以党的创建为主要内容的专题性党史读物，可分为三个板块，全书10章呈现出“四四二”结构，形成一个体系。每章着重叙述某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独立成篇；组合在一起又是个整体，比较系统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

鉴于中共党史已有多种版本的专著和读物，又考虑到各层次读者的不同需求和多数人的阅读习惯，这本书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从各个不同视角的阐述和解读，坚持用事实说话，尤其是重要时段和关键问题着笔更



浓重些，力求把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交代清楚。写作中避免空泛的议论和枯燥的大段引文，而是在弄准讲清史实的基础上，夹叙夹议，画龙点睛，回答一些人们关注或疑惑的问题，努力达到思想性、学理性、知识性、可读性的统一。这段历史处于新旧交替之时，纷繁复杂，头绪繁多，作为一本专题性的读物，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事无巨细，件件罗列，而是围绕党的创建这条主线精心选择，有取有舍，既能说明问题，又不把篇幅拉得过长。如果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看了这本书，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写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目 录

CONTENTS



❖ 前 言	1
❖ 第一章 五四风雷震撼神州	1
一、巴黎和会幻想破	2
二、京城学子掀怒潮	12
三、爱国无罪斗志昂	21
四、沪上风暴促拒签	33
❖ 第二章 科学理论指引航向	43
一、为民主科学而呐喊	43
二、马克思主义绽风采	55
三、浪漫“新生活”幻灭	65
四、晓雾散尽显真理	72
❖ 第三章 华夏劳工政治觉醒	85
一、工人阶级在屈辱苦难中诞生	85
二、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	97
三、革命知识分子“与劳工为伍”	112
四、早期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122

目 录

CONTENTS



★ 第四章	北方使节春风劲吹·····	135
一、	北方邻国旋起赤色风暴·····	135
二、	列宁寄希望于东方·····	147
三、	维经斯基使团来华·····	163
★ 第五章	南陈北李共谋大业·····	185
一、	京津途中相约建党·····	185
二、	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党”·····	194
三、	李大钊筹建“北京支部”·····	201
四、	各地精英群起响应·····	207
★ 第六章	投身实践播种中原·····	229
一、	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229
二、	积极投身工人运动·····	242
三、	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254
四、	清除无政府主义者·····	263
五、	领导和参与国外留学生斗争·····	266
★ 第七章	汇聚上海开天辟地·····	269
一、	筹备党的一大·····	269
二、	各地代表赴会上海·····	278

三、租界秘会矗立丰碑·····	292
四、闯进会场的“不速之客”·····	306
❖ 第八章 南湖泛舟开启航程·····	311
一、由上海向嘉兴南湖转移·····	311
二、画舫破浪旭日升起·····	316
三、大浪淘沙方显沧海英雄·····	326
❖ 第九章 旭日初升谱写新篇·····	359
一、中央局首发通告·····	359
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369
三、农青妇运动新起点·····	378
❖ 第十章 反帝反封建掀起波澜·····	393
一、政治舞台的首度亮相·····	393
二、民主革命纲领首次提出·····	406
三、工人运动首发高潮·····	419
❖ 主要参考文献·····	439
❖ 后 记·····	441

第一章 五四风雷震撼神州

1919年5月2日，古城北京风和日丽，天高云淡，是一个看似很平静的日子。但是，就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正酝酿着一场风起云涌的大风暴。

一大早，身着长衫、手提公文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急匆匆地来到校长办公室。他吩咐校工把一部分学生班长和学生社团负责人找来，给他们看北京《晨报》上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文章说：“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林长民，他是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的顾问，又是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文章向人们传达了梁启超从巴黎传来的惊人消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努力最终失败，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将不会交还中国，而是“让与”日本。证实了前一天上海英文报《大陆报》刊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

巴黎和会是一战胜利后召开的和平会议，实质上是战胜国与战败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会议。中国人原本对和会充满期待，希望能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手里拿回其1898年强行租借的山东半岛，同时能以战胜国的身份一改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受辱地位，但会议的结果却使中国人大失所望，不但没有使中国因战胜国的身份扬眉吐气，而且还要把德国在山东的势力



范围全部转交给日本。

看到这一消息，学生们都被震惊了！

“这是什么和会！”

“分明是强权战胜公理！”

在场的学生们，立即义愤填膺地表示：“我们必须立即请愿，阻止政府在协议上签字！”

当天下午，北京各校“国民杂志社”的一百多名成员在距校本部不远的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蔡元培在会上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号召学生们奋起救国。

听了蔡元培的讲话，学生们愤怒异常，他们决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然后采取集体行动。第二天上午，北京各中高等院校的校园内就贴出了壁报，通知当晚7点在北河沿的北大法科礼堂召开中等以上院校学生紧急大会。

一场注定将影响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狂澜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一、巴黎和会幻想破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就一步步由一个封闭的封建王朝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首先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接着是1856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后是1895年开始的甲午战争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最后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

中国从一个雄踞东方的封建大国，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遭受着越来越深的苦难与压迫。为了改变自身的境遇和国家命运，中国人民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在革命的斗争

中，既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和平改良的戊戌维新运动，也有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革命运动。但都失败了。事实证明，在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下，无论是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还是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都不是中国救亡图存的可行道路。

于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开始寻求新的救国道路。孙中山指出，中国的落后与积弊都是腐败的清政府造成的，君主专制制度是“恶劣政治的根本”，必须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政治体系，中国才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1911年，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土地上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公推革命领袖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正式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政府成立立法机构参议院，订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决定改用公历，以是年为民国元年。由于帝国主义的干预和革命力量与北洋军相比尚处于劣势，加上内部的动摇，孙中山被迫与袁世凯达成妥协，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在不废帝号、暂居宫内和年领400万经费的优待条件下宣布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是20世纪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和民族独立。中华民国建立后，民主共和的形式有了，民主共和的精神却没有建立起来。在民国的开头两年，人们普遍认为破坏已经终结，建设已经开始，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充满期待，就连孙中山也认为，民族、民权两个主义已经达到，今后所要致力的就是民生问题。但袁世凯掌握政权后，却利用人们渴望一个安定、良善的政治秩序的心理，大肆集权，剪除异己。

1913年3月，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获国会多数票，理事长宋教仁



于是依法将组织新内阁。袁世凯为了确立其独裁统治，3月20日派人暗杀了南下途中发表政见的宋教仁，然后又于10月在武力操控下，当选为总统。袁当总统后，解散了国民党，而后又解散了国会，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将总统的权力扩大到封建皇帝的权力，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并规定总统任期10年，连任不受限制，且可以传位于子孙后代。

袁世凯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他还要成为真正的皇帝。于是，袁世凯开始全力为其复辟帝制进行一系列的准备。他一面御用中外文人为其称帝造舆论，同时向各帝国主义国家媾和，争取大量借款，以弹压国内武力反抗。为了取得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巴黎和会谈判失败的山东问题，就是袁世凯同日本政府签订的卖国的“二十一条”所包括的内容。

要了解山东问题的原委，要从1897年德国人强占胶州湾说起。

4 胶州湾位于山东半岛的南部，又称胶澳，是伸入内陆的半封闭性海湾。这里历来是军事要冲，东西宽15海里，南北长18海里，水深10至15米，无泥沙淤积，是一个良好的不冻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三次到中国考察，称之为“中国最重要之门户”。

1870年，俾斯麦给驻华公使李斯福下达了“关于获得一个海军根据地的命令”，德国人从此开始以各种手段谋求占领胶州湾。德国驻华公使几次向中国清政府提出割让一个军港的要求，但都遭到清政府的婉言拒绝。

1897年11月，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的教堂被杀，成为轰动一时的“巨野教案”。虽然清政府尽力配合德国政府的要求查案惩凶，但德国仍以保护德侨民为由出兵占领胶州湾，并以武力相威逼，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条约共31项10款，主要内容有三条：

第一，德国租借胶州湾为军用港口，租期为99年，租期内中国不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

第二，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一条是由胶澳经潍县、青州、博山、邹平等地通往济南；另一条是由胶澳往沂州经莱芜到济南。中国允

许德国开采铁路沿线 30 里内的矿产。

第三，山东全省境内，德国较他国有承办中国之商务政务的优先权。

由此，德国垄断了山东的经济命脉和重要资源，山东全省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争霸性质的掠夺战争。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同盟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帝国和塞尔维亚是协约国。

早已觊觎中国的日本哪肯放过这种趁乱取利的大好机会。驻华公使日置益当时就大呼：“战则大妙！”1914 年 8 月 23 日，日本打着“承担日英同盟的义务”、“保卫东亚和平”的幌子，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随即日军两万多人在山东龙口登陆，进攻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青岛的驻军。北洋政府虽然对日本占领山东并非全然无所预料和担忧，但基于实力关系也无可奈何，只能划出所谓特别区域对日军的军事行动予以配合。11 月 7 日，日本占领德国租借地胶州湾，德军对日投降。

5

按理说，日军是为对德作战而登陆山东半岛的，德国投降之日，就应当是日本撤军之时，但日本人的目的远非如此。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提交了企图独霸山东半岛，进而吞并整个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要求袁世凯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二十一条”共分为五号：

第一号是关于山东问题。要求北洋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第二号是关于南满及内蒙古东部问题。要求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铁路的管理权限延长为 99 年。

第三号是汉冶萍公司问题。要求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周边矿山的开采及其他事宜，均由该公司决定。汉冶萍公司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当时全年钢产量占清政府的 90% 以上，控制该公司实际上等于控制了清政府的重工业。



第四号是中国沿海问题。规定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是对全中国的控制问题。要求中国政府必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警察官署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并多数聘用日本人；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的铁路建筑权归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造海港船厂及道路的优先权，等等。

显然，日本人的“二十一条”存着独霸中国的野心。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将这些要求当面交给袁世凯，并且对袁世凯说：“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日本人这么说，明显是暗示袁世凯，只要签订了“二十一条”，日本就会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心中非常明白，签订“二十一条”，不仅会引起中国百姓的民族情绪，还会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满，因此，在谈判之初，一再请求日本政府“原谅中国政府实在为难情形，勿过坚持”，“请留亲善余地”。

日本虽然也怕与其他国家产生利益矛盾，但更希望尽快达成目的，因而再三催促处于犹豫中的袁世凯政府。3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坠马受伤而不能到原定地点去谈判。按照常理，日方应当重派代表参加谈判或暂时中止谈判，但日方却深恐谈判拖得太久遭英美等国干涉，因而向北京政府提出：日公使受伤不能下床，请外交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輿到日本使馆，在日公使日置益的床前设桌谈判。这种无礼要求显然是对中国的欺压与污辱，但北京政府却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因此，“二十一条”的谈判实际上是在日本公使的床前达成的。

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下达最后通牒：如果北洋政府不迅速答应“二十一条”中的一、二、三、四号各项，及第五号中的福建问题，日本将可能采取非常手段。在日本此等的威逼利诱之下，5月9日，称帝心切的袁世凯下令中方代表对日本的要求作了完全的承认。25日，中日完成了签字换文。虽然袁世凯称帝的梦想很快破灭，他本人也一命呜呼，但“二十一条”却已既成事实。后来，中国人就把“五七”或

“五九”作为国耻纪念日。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组织责任内阁，皖系实力逐渐形成。1917年2月，段祺瑞力主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与总统黎元洪为首的反参战一派发生“府院之争”。段祺瑞为了达到参战目的，操纵督军团和公民请愿团胁迫反参战势力，造成极坏影响。5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但段祺瑞却唆使皖、奉各省督军通电北京宣告独立。黎元洪在情急之下电召安徽督军张勋的5000辫子军进京调停，但没想到张勋却搞出复辟的闹剧。在张勋复辟难以控制的局面下，躲进日本使馆的黎元洪一面委托在南京的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面重新委任段祺瑞为总理，主持讨逆。这样，段祺瑞在率北洋军阀赶走张勋之后，就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

段祺瑞再次控制中央政权后，一手抓钱，一手抓权。抓钱主要是从日本手中借款，抓权则是强化皖系势力，控制军政大权。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抓钱的目的是为抓权提供条件。

1917年8月，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从1917年到1918年，日本寺内内阁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多笔借款。据当时日本一手操办借款的西原龟三称，这些钱名义上多是建设用款，如铁路、有线电信、开矿等，但实际上，其中很大一部分被段祺瑞用来网罗和扩充皖系的政治军事势力。段祺瑞委派亲信徐树铮、王揖唐等人，用收买政客的办法纠集起政治组织“安福俱乐部”，在1918年的国会选举中击败交通系和研究系，组成“安福国会”。同时，段祺瑞亲自担任参战督办，同日本订立参战借款，由日本提供军火和教官，编练了三个师的参战军。参战军名义上是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这支队伍并未真正参战，段祺瑞的真正目的是要发展一支自己的嫡系军队。这支军队既可以巩固皖系的统治，又可用来对付孙中山的南方军政府。

日本人给中国的借款看似优惠，但却有着深刻用意。1916年，日本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后，鉴于其前任大隈重信以武力侵华，引起国内外指责。寺内遂改变策略，标榜“尊重并拥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与列强保持